



求真集

——我的治学之路

崔摇敏摇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摇京 ·

目摇摇录

自摇序	(员)
第一辑摇人生轨迹	
摇一、我的身世	(员)
摇二、学生时代	(缘)
摇三、踏入社会	(员)
摇四、“文化大革命”蒙难	(苑)
摇五、十年熬煎	(圆)
摇六、重返校园	(猿)
第二辑摇哲学与政治学研究	
摇一、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名	(猿)
摇二、评“客观主义”和“镜子论”	(源)
摇三、关于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问题	(缘)
摇四、实事求是地阐释毛泽东思想	(缘)
摇五、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	(缘)
摇六、人为什么会犯错误	(圆)
第三辑摇宪法学研究	
摇一、关于国体与政体	(苑)
摇二、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苑)
摇三、关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苑)
摇四、正确阐释言论自由	(苑)
摇五、论述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	(愿)
摇六、新宪法是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	(愿)
摇七、增强法制观念摇维护宪法尊严	(怨)
摇八、解析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怨)
第四辑摇中国法制史研究	
摇一、钻研中国法制史	(怨)

摇二、沈家本法律思想研究	(员圆)
摇三、撰写与出版《中国古代刑与法》	(员圆)
第五辑摇理论法学研究	
摇一、进入法学殿堂	(员圆)
摇二、对法的定义的商榷	(员圆)
摇三、阐述法律的客观性	(员圆)
摇四、阐述法律的社会性	(员圆)
摇五、阐述法律的继承性	(员圆)
摇六、质疑“法律消亡论”	(员圆)
摇七、论述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	(员圆)
摇八、理论法学争鸣的回顾与总结	(员圆)
第六辑摇刑事证据学研究	
摇一、刑事证据三性论	(员圆)
摇二、刑事证据分类研究	(员圆)
摇三、对运用证据若干疑难问题的求索	(员圆)
摇四、评维辛斯基的诉讼证据理论	(员圆)
摇五、论唐律规定的证据原则	(员圆)
摇六、主持国家课题“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	(员圆)
摇七、主编教材《刑事证据学》	(员圆)
第七辑摇死刑问题研究	
摇一、论慎杀——魏清安被冤杀的反思	(员圆)
摇二、再论慎杀——评“凶犯六天伏法”	(员圆)
摇三、三论慎杀——罪大恶极者真诚悔罪能否不杀	(员圆)
摇四、四论慎杀——从一起故意伤害案的判决谈起	(员圆)
摇五、五论慎杀——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	(员圆)
摇六、死刑问题论纲	(员圆)
摇七、死刑复核程序研究	(员圆)
第八辑摇免于起诉的废除	
摇一、免于起诉制度存废争论的背景	(员圆)
摇二、介入免于起诉存废的争论	(员圆)
摇三、考察免于起诉制度的由来和发展	(员圆)
摇四、免于起诉制度的利弊分析	(员圆)
摇五、对免于起诉制度存废的不同观点	(员圆)
摇六、免于起诉最终被废除	(员圆)

第九辑 收容审查的取消

- 摇一、收容审查制度的由来和演变 (圆园员)
- 摇二、收容审查的现状、问题和两种对立意见 (圆园源)
- 摇三、向前看——寻找出路 (圆园元)
- 摇四、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取消收容审查 (圆园苑)
- 摇五、逮捕条件的配套修改 (圆园愿)
- 摇六、拘留条件与时限的相应修改 (圆园园)
- 摇七、取消收容审查的意义 (圆园猿)

第十辑 摇“怨·圆决定”的废止

- 摇一、“怨·圆决定”的内容 (圆园源)
- 摇二、对“怨·圆决定”的总体评价 (圆园缘)
- 摇三、“怨·圆决定”的主要问题 (圆园缘)
- 摇四、苏联 圆园世纪 猿园年代的类似立法 (圆园元)
- 摇五、对基本法的修改不应与其立法精神相抵触 (圆园苑)
- 摇六、重温毛泽东关于慎杀的论断 (圆园怨)
- 摇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圆园员)
- 摇八、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最后决断 (圆园员)

第十一辑 摇黑社会犯罪研究

- 摇一、介入黑社会犯罪研究 (圆园猿)
- 摇二、“黑社会”定义解析 (圆园苑)
- 摇三、“有组织犯罪”探析 (圆园元)
- 摇四、中国大陆究竟有没有黑社会犯罪 (圆园元)
- 摇五、黑社会犯罪成因分析 (猿园元)
- 摇六、遏制黑社会犯罪的对策与建议 (猿园源)

第十二辑 摇毒品犯罪研究

- 摇一、一个将会长期困扰人类的烦难问题 (猿园元)
- 摇二、对毒品犯罪发展趋势预测的基本依据 (猿园元)
- 摇三、毒品犯罪近期发展趋势的预测 (猿园猿)
- 摇四、对禁毒工作的若干制约因素 (猿园元)
- 摇五、遏制毒品犯罪的八项对策建议 (猿园元)
- 摇六、尾声 (猿园元)

第十三辑 摇呼唤法制文明

- 摇一、论“三个文明一起抓” (猿园苑)
- 摇二、如何保证严肃执法 (猿园元)
- 摇三、刑讯逼供批判 (猿园愿)

摇四、再论遏制刑讯逼供	(猿园)
摇五、倡导公安监管文明	(猿猿)
第十四辑摇域外法制的考察与研究	
摇一、“判例法”是完备法制的重要途径	(猿愿)
摇二、英国的审判前程序	(猿源)
摇三、香港缉毒警察如何运用证据	(猿怨)
摇四、对泰国查处毒品犯罪如何运用证据的考察报告	(猿缘)
第十五辑摇沉默权问题研究	
摇一、关于“沉默权”问题的理性思考	(源圆)
摇二、“沉默权”制度纵横谈	(源员)
摇三、沉默权问题论纲——关于沉默权与警察讯问权的考察与反思 ..	(源缘)
第十六辑摇司法改革建言	
摇一、健全诉讼法制摇实现“依法治国”	(源源)
摇二、关于司法改革的若干构想	(源怨)
摇三、论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	(源源)
摇四、论检察机关的权力重组	(源怨)
摇五、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	(源缘)
摇六、司法公正与构建和谐社会的	(源缘)
第十七辑摇公安执法研究	
摇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公安建设	(源员)
摇二、公安工作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与法制现代化的挑战	(源猿)
摇三、公安机关的角色定位和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源猿)
摇四、公安机关是否有立法权	(源圆)
摇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公安执法文明	(源苑)
摇六、强化证据意识摇提高办案质量	(缘圆)
第十八辑摇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	
摇一、重温董老教诲摇呼唤法制文明	(缘猿)
摇二、注重体制创新摇实现依法治国	(缘圆)
摇三、从“依法办事”到“依法治国” ——重温董老在八大的发言	(缘愿)
摇四、重温董老教导摇健全司法制度	(缘猿)
摇五、依法执政是提高执政能力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關鍵	(缘圆)
第十九辑摇随想与茶话	
摇一、漫谈“严谨治学”	(缘源)
摇二、关于“处女卖淫”的对话	(缘苑)

摇三、因证据不足而不起诉的案件是否要赔偿	(缘园)
摇四、有感于海淀签约	(缘缘)
摇五、评市委的“三不”自律	(缘元)
第二十辑摇对几起典型案例的评析	
摇一、一起免予起诉案件的剖析	(缘贞)
摇二、评首例墨宝讼案的终审判决	(缘葩)
摇三、法律如何裁断科学——评“邱氏鼠药”案的一审判决	(缘圆)
摇四、诉讼程序岂能如此随意	(缘葩)
摇五、对余祥林冤案的评析	(缘贞)
第二十一辑摇毒品犯罪证据研究	
摇一、申报国家课题获准立项	(缘熙)
摇二、前期工作取得成果	(缘熙)
摇三、对证据立法的若干建议与论证	(远熙)
摇四、选编、出版《毒品犯罪证据运用典型案例评析》	(远圆)
摇五、撰写课题研究主要成果	(远源)
第二十二辑摇经验与体会	
摇一、关于品德修养	(远缘)
摇二、研究学问须具备的六个条件	(远愿)
摇三、关于学习方法	(远贞)
摇四、怎样写论文	(远圆)
摇五、几点治学经验	(远猿)
后摇记	(远熙)

自摇摇序

人生一世，不求名、不图利、不谀官者，少矣！余则以“六不”自勉。“六不”者，不贪图安逸享受，不追求名利地位，不趋炎附势，不人云亦云，追求真理不随波逐流，独立思考不盲目信从，并将这“六不”书之于座右铭。

余最爱翠竹，倾慕其色、气、节，故将书斋命名为“劲竹书屋”。“劲竹”者，寓气节长存、宁折不弯之意也。

有道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此话不假。在我的个性中有一股犟劲，认准了的事，就要勇往直前，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冲上去，遇到十级风浪也不动摇。在当今社会，这种性格极容易成为挨整的对象。“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蒙冤十年，险些丢掉性命却痴心不改，平反后又加入到理论创新者的行列，以“邱臻”、“李秋贞”等谐音为笔名参与学术争鸣，在若干重大的理论是非和学术问题上发表了一些独到见解，自然又会遭到明枪暗箭。但终究是时代不同了，我所提出的大部分意见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同。

聊以自慰的是，在我的论著中没有假话、空话、套话和废话。我在进入理论研究的殿堂后，触及了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并曾在若干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与学界同仁进行过激烈的论战。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当初曾因此得罪了一些人，但平心而论，似乎还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我所提出的主张和建议，有许多已被立法机关和司法实际部门采纳，好在没有放空炮。

迨止今日，从教已 濛年，涉猎的学科领域颇多。现将一生的经历以及进入研究领域后的理论是非和学术争鸣作一番回顾与梳理，留此存照，也可对后代子孙有个交代。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第一辑为“人生轨迹”，先将我的身世和一生的坎坷经历向读者作概略交代。其后的各辑，大致依写作的时间顺序，把后半生进行理论探讨与学术研究的各项成果分作 圆个专题，分门别类将每个专题中的主要观点归纳整理。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我的治学历程和基本思路。最后一辑为“经验与体会”，可供有志求学者参考借鉴。

古人云：“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本人一生没有多少长处，唯“刻苦”和“坚韧”是两个长项。记得若干年前，为了钻研某一问题或阐述某一新见解，经常连续熬夜多日，往往通宵达旦彻夜不眠；盛夏三伏闷热难耐大汗淋漓（当时没有空调又买不起电扇），腕肘长满了痱子以至于溃烂，仍不管不顾伏案写作。当我提出的某些新观点被人误解乃至遭受非难之时，我却傲视群雄据理力争。本人治学的信条是：一不唯书，二不唯上，三不从众，为追求真理而奋不顾身，此皆余之性格使然。

时年已过 苑岁，不敢与天命抗争，但求保持晚节而已。愿本书能给晚辈后生留下一点可读、可思的东西，错漏瑕疵之处，敬请同行学者与读者诸君斧正。

第一辑

人生轨迹

在进入学术领域之前，先回顾一下人生轨迹和主要经历，由此可以窥见我的成长过程和心路历程。

一、我的身世

我于 1935 年阴历六月初二^①生于山西省太原县（现太原市小店区）北格镇张花村。据说，我的曾祖父早年经商，但到祖父时家境败落下来^②，以致到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地步，只好借别人家的破房子住，我是在借住乔家的一处破败的小院内出生的。

（一）我的双亲

父亲小时酷爱读书，但家境贫寒，念完小学便无力供他上中学了。小学老师看他特别好学，便力劝家里让他继续深造，并推荐他考取了太原师范学校，主要是因为上师范学校不需要交学费。后来听父亲说，他在读书期间，由于字写得比较工整，经常帮老师刻讲义，挣一点辛苦钱以补零用。

太原师范当时在山西省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这个学校出了许多革命的先驱者，例如抗战初期由共产党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许多创始人和骨干，大多是太原师范的尖子生。在这样的环境里，父亲在学生时代就受到爱国和革命思想的熏陶，具有爱国心和正义感。师范毕业后，父亲先回到老家在本村的小学校教书，不久便被聘为北格镇高级小学的校长。

我出生时，已经是侵华日军攻占华北的第二年，太原已经失守，我的家乡成了日本鬼子的占领区。北格当时是太原县第三区的中心镇，因此北格高小又

① 据万年历推算，1935 年的阴历六月初二应该是阳历 7 月 1 日。解放后领户口本时，阴历六月初二是当年的阳历 7 月 1 日，因此户口本与身份证上填写的出生日期都是 7 月 1 日。

② 据说，我的祖父稍识几个字，是一位“阴阳先生”，在我出生前已去世。

称“三高校”。此时，父亲与地下党和八路军的游击队建立了联系，曾多次掩护地下党员和武工队员逃脱日伪军的追捕，并帮助八路军购买紧缺医药和其他急需用品，做了许多资助抗日的工作。

关于父亲的这一段历史，在两本书中有所记载。肖辉同志所著《龙啸——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真实故事》中有这样的记述：

三高校的校长和教师都有些来历。崔校长与太行山榆（次）太（谷）县路西武工队的王立岗、王伟、李彦之来往甚密，来三高校前曾得到他们的同意，互相间牵着一根革命的红线。……矗立在北格镇的三高校，是日军统治下黑暗社会的灯火。它犹如午夜的星光，给孩子们以温暖、智慧、力量，并引导他们绕过暗礁，奔向光明的前程。……在音乐课上，崔校长教学生唱岳飞的《满江红》以及《空谷幽兰》等歌曲，鼓励学生们“驾长车踏破贺兰山……”以肃“靖康之耻”；教育学生不随波逐流，不与日本鬼子和汉奸同流合污，要做高洁、清静、幽雅的兰花。

办好一座学校，关键是校长和教师。三高校是当时全区几十个村庄的最高学府，有善于应酬、维持局面的校长，有真心实意拯救孩子心灵的教师，各村以及周边的徐沟、榆次两县所属的一些村庄慕名而来求学的学生日盛一日，鼎盛时期光住校生就有五六十人。

对三高校，敌、我双方都很重视。日本鬼子和汉奸常到学校监视、听课。事前，崔校长总要亲自检点，精心策划一番，上些不引起敌人怀疑的课。抗日政府的葛向明县长和林毅县长也多次在距离北格镇不远的三贤村召集三高校的教师开会，时间多在晚上，教师们总是按时摸黑前往，身在敌垒，心系延安。我方工作人员李又生、赵晨、王立岗等常到三高校进行秘密联系，检查布置工作。有时是因环境恶化，在外面待不住，到三高校避难。到此，自有人安顿食宿。

在三高校这块合法牌子的掩护下，崔校长和榆（次）太（谷）县路西武工队王立岗等联系更加紧密，常只身去南格村张三虎家与王立岗接头。驻扎在北格镇的汉奸特务队长杜子珍，原是国民党军的一个连长，此人极坏，专调查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奔袭、捕捉我方工作人员，起着日本鬼子起不到的作用，广大群众对他恨之入骨。王立岗决定迅速除掉他，即给崔校长布置摸清汉奸特务队长杜子珍的出入行径。1945年春，崔校长探听到杜子珍要到张花村敲诈勒索，即火速告知住在南格村的王立岗。王立岗喜出望外，带几个武工队员，埋伏在北格镇通往张花村路旁的渠里。当杜子珍骑自行车过来时，王立岗等犹如猛虎扑食，跃出渠堰，将杜子珍生擒活捉，为民除了一大害。崔校长的革命活动，保密性很强，此事，要不是解放后王立岗讲，人们还蒙在鼓里呢！

校长、教师的言传身教，使学生们的心灵深处镌刻下：

爱我中华，还我华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誓死不当亡国奴，拼命争自由！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做一个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斗士。

三高校从 1939 年冬开办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共有五期高小班毕业，约 1000 余人。毕业后的学生，没有一个为日本帝国做事的，多数人跟随共产党参加了革命。日本投降后，三高校全体师生对国民党反动派不要和平打内战的反革命行径十分痛恨，发誓与蒋、阎反动派战斗到底！为此，崔校长带全家上了太行山。^①

王立岗同志所著《战斗在晋中平川》，也有如下一段记载：

不久，我们又向北格敌据点内发展，首先沟通了北格镇高级小学以校长崔立中为首的 苑位男女教员。我们常在深夜进入学校同这些教员开会，讲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情况，通过他们了解掌握北格镇敌伪的情况。有一天夜里，我同王伟在学校开完了会，可第二天一早敌伪即包围了学校，进行搜查，并捉走了校长崔立中。因为我们事先有准备，敌人又没有搜出什么可疑物品，崔立中很快就被放出来了。经了解，是伪军队长杜子珍这个坏蛋干的。杜子珍原是国民党一个连长，投敌后成了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为此，必须消灭此贼，不然北格工作难以开展。

初夏的一天，崔立中通过胡在中送来情报，说杜子珍已去张花一带勒索群众，只带一个人。于是，我同王伟在南格村水渠中等他。我们是二比二，又是伏击，很有把握。可是不久就乌云翻滚，下起小雨，我俩等了约半小时，认为他们不会来了，就又骑自行车去张花村。我的车子在前边，在张花村北小庙旁，我发现麦田里蹲着两个人，我同王伟打招呼要注意，王伟说两人没关系，我也麻痹了，说着我俩已骑过去了。突然前面两人站了起来，有一个戴着法国白盔，两支 匣响分别对着我们两人。

我俩被逼下了自行车，那个戴着法国白盔的家伙操着南腔北调的话语质问我们：“干什么的？”我回答：“老百姓。”这时敌人枪响了，击中了王伟的左肩。只听王伟一声吼，猛扑上去，卡住了敌人的枪，两人滚到了一边。另一个敌人一枪从我侧面打过来，我一闪身未击中。此时我的枪响了，那个敌人滚到了一边。我赶紧回头，只见王伟被那个敌人压在底下，但还是死卡住敌人手枪。我用枪指着敌人脑袋，敌人还不松手，枪响了，

^① 参见肖辉：《龙啸——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真实故事》，1983年版，第 153-154页。

敌人倒在一边。遗憾的是我的子弹不但穿透了敌人的头，也打伤了王伟的手。^①

关于儿时的生活，我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印象较深的是：在我源岁时，父亲得了一场很厉害的伤寒病，回到家里躺着养病。有一天，突然冲进来一伙日本兵，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直奔父亲卧病的房间而来。当时我站在门口，竟临危不惧，用稚嫩的声音大声喊：“家里有病人哩，家里有病人哩。”鬼子兵听到家里有病人，担心染上传染病，马上掉头走了。这件事，后来母亲经常说起，夸我小时候很机灵，因此记忆深刻。

（二）上太行山

1948年怨月，父亲在党组织的接应下，毅然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上了太行山。当时，设在左权县的太行第二中学，是解放区的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组织上安排父亲到太行二中当了语文教员。第二年（1949）夏天，组织上又派人找到我的母亲，把母亲和我（刚满愿岁）都接上了山。开始，我随母亲在太行干部家属学校学习，不久母亲被安排到太行区保育院参加了工作，我则被送到左权县蒿沟村上小学，一年后转到太行区育才学校。

当时的敌我斗争极其残酷。听母亲说：父亲的一位朋友——榆太祁路西县长吕惠民同志在战斗中被俘，敌人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榆次县城门上示众，这大约就是古代的“梟首”刑。面对凶残的敌人，我方抓住敌特分子自然也毫不留情。记得在太行干部家属学校时，随母亲参加当地斗争特务、恶霸的群众大会，就亲眼看到愤怒的群众把几个敌特分子活活打死——先是把斗争对象押上一个用木板搭起的台子，台下民众纷纷控诉他们的罪行，群情激愤。突然，有人将被斗者一把推下台去，众人上前拳打脚踢，再用石头与棍棒乱打一气，然后一个民兵上来，用大刀将已被打得半死的那个人的头砍下。另一人可能是罪恶更大，被绑在一棵树上，众人拿着镰刀、菜刀、剪刀排着长队前去，每人挖掉他的一块肉，直至体无完肤才毙命。这大约就是古代所谓的“凌迟”刑，俗称“千刀万剐”。我在愿岁时看到这般惨景，吓得浑身哆嗦，几天吃不下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我的父母于解放后随单位搬回太原，父亲先在山西省工农速成中学任教，后来曾在山西省委宣传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前调到太原市第五中学任副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猛烈冲击，糖尿病加重，中风后偏瘫卧床愿年。1968年随我迁居北京，于1969年猿月病逝。父亲去世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分钱的遗产，只留下一件我在大学毕业前给他买的一件呢子大衣。他可真是应验了那句话：“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件呢子大衣，我接着穿了几年，我的

^① 参见王立岗：《战斗在晋中平川》，1983年版，第158—159页。

二儿子又穿了几年，最后在张家口地震后捐给了灾民。

母亲进城后，在山西省保育院工作，后来调到山西省林业厅，**1955**年从山西省林业设计院离休，**1985**年异地安置来到北京，与子孙在一起安度晚年。

我的父母都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只不过是两个早年投身革命的普通的共产党员。记得父亲在他的晚年，神志尚清醒时曾说过一句话：“我对你们子孙别无他求，一生不做亏心事，就算对得起祖宗了。”这句话，我始终铭记在心。

二、学生时代

（一）小学生活

少儿时期，我在原籍张花村的小学校只念了一年书。愿岁随母亲上了太行山，先跟着母亲在太行干部家属学校待了几个月。母亲参加工作后，我被送到左权县^①蒿沟村小学，后转入太行区育才学校（先是在河南省涉县会理镇，后搬到武安县阳邑镇）。**1955**年源月太原解放^②，怨月，我所在的学校集体搬迁回太原（乘汽车经邢台、石家庄至太原），与太岳区育英学校合并，改为山西省干部子弟学校（当时学生都住校），至**1956**年底小学毕业。

记得看到的第一部电影是《解放太原》，印象中攻坚战打得非常激烈。解放军突破首义门攻进城后，还打了三天巷战，双方死伤甚多，真所谓“横尸遍野”。我军攻入太原后，又挖出了被敌人活埋的无数烈士与无辜百姓的尸体，惨不忍睹。

（二）中学时期

1956年春，考入山西省进山中学（后改为太原市第六中学，“文化大革命”后又恢复为进山中学），初中与高中连上五年半，**1961**年苑月高中毕业。

上初中时，我是班里有名的淘气包，整天贪玩。当时没有什么玩具，主要是打扑克和弹玻璃球，弄得满手泥土还乐此不疲，学习成绩总是排在倒数第几名。**1961**年秋季上了高中后，也许是受了侯耀永、杨春智等几位好友的感染，不知不觉间仿佛变了一个人，学习自觉性大大增强，各科成绩都迅速赶了上去，在班里也成了一个活跃分子。当时，我所在的高八班有一位很有天赋的音乐家——张文治，他自编了许多雄壮优美的歌曲，班里还组织了合唱队和舞蹈队，经常在校内外演出。当时都是住校，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由于营养不足，

① 左权县原名辽县，因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该县牺牲，改名为左权县。

② 太原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老巢，由于阎锡山反共最顽固，并依赖其有水泥和钢铁，在太原外国建造了很多碉堡，解放军于**1949**年秋季包围太原，愿个多月未能攻克，直至**1949**年源月圆日发起总攻，才于源月圆日与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同一天解放。

缺乏某种维生素，我曾几次患夜盲症（吃一点猪肝或鸡肝即可治愈），但班上的气氛活跃，同学们在一起十分开心。

上高中三年级时，正值印度电影《流浪者》在全国放映，我和很多同学在一起看了这部电影。电影的主题是通过一个虚构的故事——强盗扎卡为了对不公正的法官拉贡纳特进行报复，蓄意把他的儿子训练成贼，诙谐地批判了“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的血统论。看过这部电影，使我对法律与法庭审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在将来成为一名公正的法官。恰好当时正要填报高考的志愿，遂决定报考法律专业——一部外国电影竟在不知不觉间影响了我对未来职业的选择。更未想到的是，我竟同时被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录取，最后我选择了上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三）考入北大

20世纪50年代中期，高校招生采取两种方式：大部分学校参加全国统一招生；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是国家特许单独招生，提前半个月考试。因此，我报考了北大和人大两所大学的法律系，先后参加了两次高考。在参加全国统考的第一天，下了考场回到学校，一进校门就听到门房的大叔喊我的名字，说有我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中国人民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但并不是被法律系录取，而是被调整到了统计系。已经肯定能到北京上大学，心里就踏实了，后两天再进考场就不再感到有什么压力，轻松地考完了六门课。半个月后，北京大学也给我寄来了被法律学系录取的通知书，这使我喜出望外。我立刻给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写了一封信，说明该校统计系录取了我，但不是我的第一志愿；后来又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我希望能到北大去学法律，请问是否可以？很快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回信，同意让我按照自己的志愿到北京大学去学法律。

于是，我便登上了进京的火车，高高兴兴地到北大去报到。车轮轧过铁轨的“咯塔咯塔”声，听起来竟像是“开往北京”，更使心情异常激动，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然而，在北大的五年却过得并不平静，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惊涛骇浪。

平心而论，刚入学的第一年（1952年秋至1953年夏），是美好、宁静的一年。1952年9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开放的大会，各国共产党都派代表到会致贺词，热情洋溢地发表了很多赞扬中国的话。此时的新中国正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在外交上也逐步打开了局面。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化气息浓厚，思想活跃，生活也相当好：早餐豆浆、油条和炸蚕豆随意吃，中餐和晚餐都有美味可口的饭菜，每月只需交5元伙食费。校园的环境幽雅、秀美，未名湖畔的垂柳和湖光塔影令人迷醉。学生们自发地组织了许多社团，课外的文体生活

非常丰富，每逢星期六晚上都有音乐会、舞会和放映电影^①，有如此安静、祥和的学习环境，同学们都很满意并感到由衷的自豪。

1957年缘月，我们班的几个年龄较小的同学在一起商量：能否请求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接见一次，当面聆听董老的教导。大家委托荀志伟同学给董老写了一封信，很快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的回信，表示董老十分愿意接见我们，但因董老年事已高，参加的人数要控制在 10 人以内。于是大家推举了 10 名代表，于远月 15 日到最高人民法院聆听董老的教诲，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②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参加这次接见的李国光同学，1991 年后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

（四）从“反右派”到“大跃进”

然而，好景不长。1957 年夏天突然来临的一场“反右派斗争”打乱了平静的生活，使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记得这一年的远月 1 日是一个星期天，我和同窗好友史焕章^③到颐和园^④游泳，傍晚回到学校，一进校门，就听到大喇叭高声播放《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对前一段“大鸣大放”中发表的言论发起了猛烈反击。从此风向逆转，一场“摧枯拉朽”的“反右派”斗争大规模地展开，我们班有两名同学被打成“右派”。据说，北大是“右派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第一批划了 1000 多名“右派”，第二批又补划了 1000 多名，总计 2000 余名师生被打成了“右派”。这是一场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摧残，被打成“右派”的，有的不堪凌辱而自杀^⑤，更多的则是被送去劳动教养。^⑥从此，知识分子尽皆哑然，形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可惜，当时我自己因社会阅历太浅，并不理解这场运动的真正意义，还随着大流“反右派”。

1958 年，毛泽东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动了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和平整土地的“大跃进”运动。北大校园里也建起了“小

① 北大当时有 1 万多名学生，由于人太多，一般都是在操场露天放映电影（下雨天则在大饭厅放映），观众自带小方凳，分别在银幕两边看正反片。

② 由于这次活动是由二班的同学发起，因此，大家商定由二班去 10 人，一班与三班各去 5 人。

③ 史焕章是上海人，调干生，长我 10 岁，是我毕生最信赖的兄长。毕业后被分配到西藏公安厅，在西藏工作了 10 年后回到原籍，先任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后被任命为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此是后话。

④ 颐和园曾是清代的皇家园林，是北京最大的公园。当时门票只要 1 角钱，在学校买集体票只需 5 分钱。北大离颐和园很近，步行半小时便可到达。从食堂带两个馒头夹一点咸菜，到颐和园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因此，住北大 10 年，到颐和园数十次，并且在那里的游泳场学会了游泳。

⑤ 法律系 10 级就有一位担任过朝鲜人民军中校的朝鲜族同学金元红自杀了。

⑥ “劳动教养”原本就是为处理“右派分子”而创立的一项制度，据说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种好办法。法律系 10 级有一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魏巍同学被送去劳动教养，从此，失去人身自由长达 10 年，后被驱赶回原籍浙江省余姚县务农。“劳教”的严厉程度不亚于刑罚，后来被扩大适用于其他各种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人。

高炉”，把大批铁锅、铁锁等本来可用的东西都拿去炼成了废铁块。是年秋季，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北大师生被安排投身于“大跃进”的实践。法律系三、四年级的全体学生在范明、巫宇甦两位老师的带领下，打乱建制，分别到河北省的藁城县和河南省的禹县^①、长葛两县参加“大跃进”实践。我和李秦、李国光、彭玉泉、荀志伟、李祖遐、谢长根、金岳鸣共愿名同学被分配到禹县“鸠山红专大学”当教员。

上山前，我们愿位同学都在山下的官山煤矿招待所住了猿天，正值八一电影制片厂在附近拍《江山如此多娇》^②的外景，县委将这些电影演员待为上宾，一日三餐都是八盘、八碟、八碗的美食款待。我们也被安排陪吃了三天美餐，晚上则在煤矿礼堂观赏河南省豫剧院三团著名演员高洁、马林主演的《朝阳沟》、《五姑娘》等现代剧，仿若神仙。当时正是“大跃进”的宣传处于最高潮之时，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早实现”等，我们也被带进了共产主义，过了三天神仙般的好日子。

三天过后，我们上山进入了“鸠山红专大学”^③。这里的条件与山下招待所美味佳肴的“共产主义生活”产生了巨大反差，从“仙境”一下子跌落到了真实的人间。

“鸠山红专大学”坐落在一座山头上，占据了几百年前建成但早已废弃的一个石砌山寨（就如同《水浒传》中的山大王占据的“二龙山”那样的山寨），一日三餐都是红薯干面稀糊糊^④，我们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半年，没有吃过一顿细粮。师生都住在一个个石砌的窑洞里，地下铺着稻草，用几块木板钉起来权当房门。到了冬天，窑洞里不生火，外面下着大雪，北风从石头缝里和门缝里吹进来，寒冷刺骨，就如同掉进了冰窖一般。记得当时曾作过一首打油诗：

① 禹县后改为禹州市。

② 《江山如此多娇》是一部以河南省禹县的女劳模岳仙为原型的电影，由著名女演员田华主演（剧中的女主角改名为郭仙）。由于劳模岳仙就住在鸠山脚下的一个村庄，故八一厂到该地拍外景。

③ 这所学校是“大跃进”的产物，实际上只是一所中等学校。学生都是初中毕业生，实行勤工俭学，劳动一天，上课一天。由学生自己下山挑水、运粮，自己做饭，教师不发工资。这种半工半读的教学方式，确属一种创举，因此颇有名气。《光明日报》用整版篇幅对这个学校作了报道，康生亲自为它题写了校名。

④ “大跃进”时，由于农村劳动力都被调出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这一年风调雨顺，本应是一个丰收年，但成熟的庄稼因无人收割而烂在地里。红薯刨出来后，无法运回村里，被就地处理——切成红薯片，放在地面上晾晒成红薯干，再把这些沾满了泥土的红薯干磨成面，这便是当时河南农村的主粮。“鸠山红专大学”每天都是吃这种用红薯干面煮成的稀糊糊，吃了以后大便干结，甚至拉不出屎来。